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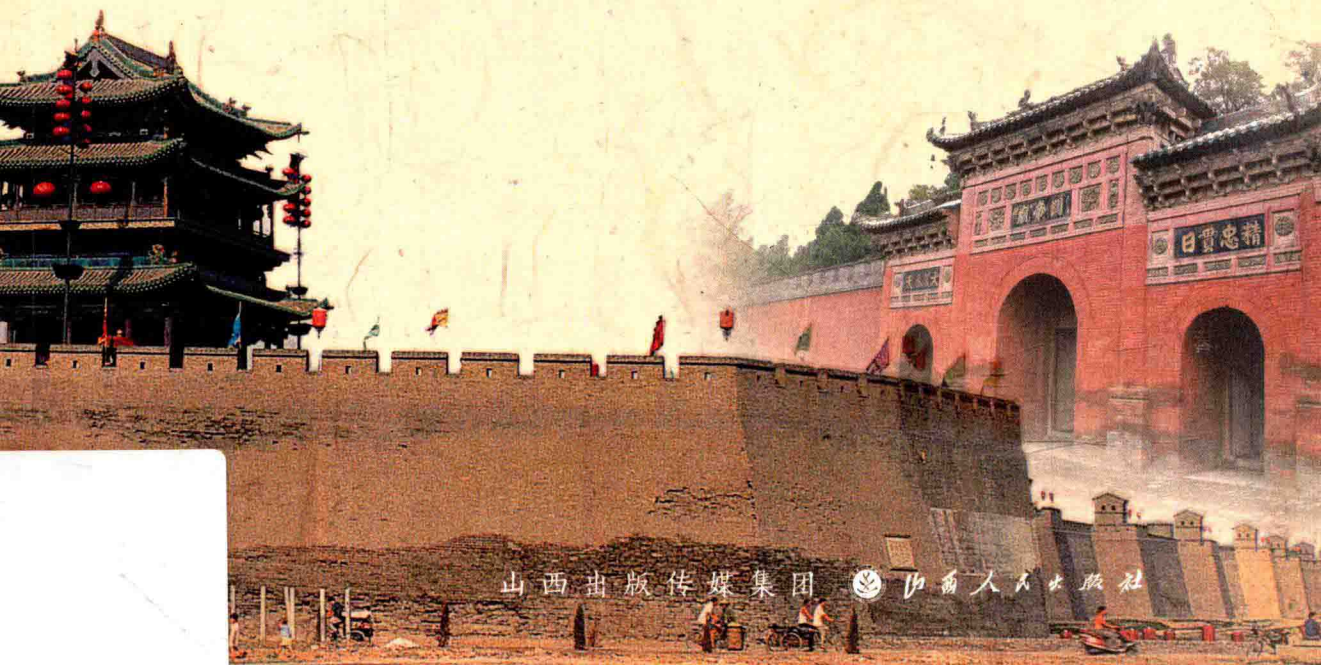


SHANXI WENHUA

品 读 山 西 文 化

山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编著

- 炎帝农耕文化
- 尧舜德孝文化
- 关公忠义文化
- 能吏廉政文化
- 晋商诚信文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品
读
山西文化

山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读山西文化 / 山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203-10095-9

I. ①品… II. ①山… III. ①地方文化 - 文化事业 - 建设 - 山西 IV. ①G12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9268 号

品读山西文化

编 著: 山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顾 问: 杜学文

责任编辑: 蔡咏卉

复 审: 冯灵芝

终 审: 蒙莉莉

监 制: 张梅霞

统 筹: 王小毅

装帧设计: 李虬岳 孟成钢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 - 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 0351 - 4922159

E - mail: sxskeb@163.com 发行部

sxske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e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7

字 数: 5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17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10095-9

定 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谈谈山西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贡献

杜学文

《品读山西文化》一书将要出版了，编者嘱我写点文字。不知道该从什么角度谈起，就想简单谈下山西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贡献。虽然有些泛泛而论的意思，但也是近来思考比较多的问题，能够借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交流，还是很好的。不过，这里所谈的文化，应该是一个比较狭小的层面，不包括器物、制度以及科技、艺术等，仅从价值观的层面说一些自己的想法。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从民族文化的形成来看，山西地区的贡献还是非常突出的。这与山西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山西地处北部温带地区，无霜期比较长，但又不同于热带地区，便于土地保持活力，也使农作物能够有较长的生长期。这一点与世界各大文明的情况基本相同。当然，由于各地的地理、气候条件差别较大，它们的具体环境又各有不同。但是，总的来看，这样的自然条件是适宜于生命成长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黄土由于其土质疏松、宜耕宜种、耐旱保水，也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有利条件。如此种种，使山西成为一处极其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地区。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稻作农业的原生地。不过，这一原生在长江流域，特别是江浙两湖地区。当然，中国也是粟作农业的原生地。这一原生地主要在太行山沿线，包括山西的大部分地区。这一点已经为考古学所证明。除河北磁山遗址、河南裴李岗遗址外，山西的下川遗址、柿子滩遗址、西阴遗址等均发现了粟作植物的果实或石磨、石棒、石铲、石镞等反映农业生产及其变革的遗存。这些考古发现与史籍的记载十分吻合，均可证明山西地区是农业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一定的文化之形成，必然与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根本性联系。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农耕生产决定了从事农业的族群之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伦理关系与价值体系。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山西地区是农耕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并不等于在这一带只有农业生产，也不等于说，这里的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是农业。这是非常简单机械的一种看法。实际上，人

类的生产方式在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采摘方式，之后发展到渔猎方式，而后在一些地区出现了游牧方式，一些地区出现了农耕方式。其进程是错综复杂、相互重合的。根据我们的神话与传说，炎帝神农氏使农业从采摘发展到种植。这当然是一场巨大的技术革命，大约应在距今五六千年时。如果根据考古发现来分析，时间应该更早，但是，即使是到了舜生活的时代，渔猎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生产方式。所谓“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这就说明舜时是农耕与渔猎等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只是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是种植农业而已。

还有一个问题是，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也并不是截然而分的。一般我们认为草原地区是游牧生产方式，而往南进入中原内地则是农耕生产方式。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划分。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气候与地理环境的不同，二者虽然有大致的分界线，但是，在很多地方是混合的。也就是说，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错杂交叉存在。这从晋文公的经历中就可以看出来。那些在比较偏远、高寒地区的族群多为游牧。而那些在比较温暖、平缓地区的族群则多为农耕。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非常长，至少到汉代仍然如此。另外，随着不同政治势力的改变，这种区别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大大地拓展了农耕地区，基本上迫使重要的游牧族群退出内地进入草原。所以，尽管山西地区生活着很多从事游牧生产的族群，但从总体上来看仍然是以农耕为主的地区。这就决定了其生活方式、伦理关系是以农耕为主并适应农耕与游牧融合的状态。如定居为主，重视家族家庭关系，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使天文历法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形成了重人与重天相统一的观念，能够包容不同生活习俗的开放心态等。可以这样说，由于山西地区自然环境与生产生活情况的特点，而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

这种价值观念的形成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根据考古发现，我们可以认为在尧时华夏文明作为一种古文明已经形成了。这在陶寺遗址中已经得到了证明。文明形态的形成除了考古学家们所言的若干要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价值体系的形成。当然我们还不能说在陶寺时期已经形成完备的价值体系，但我们可以说至少在那一时期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价值观。不过，就山西地区而言，至少炎黄二帝，以及之后的尧舜禹等的言行已经体现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比如炎帝，为民请命，以身试毒，种五谷、尝百草，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黄帝则是“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清心寡欲，节俭俭行，“以信与仁为天下先”。尧则住茅草屋，吃粗茶饭，协和万邦，其仁如天。舜有大孝，有大德，以德治国，以法行令，任贤才，重民意，政教大行，八方宾服，四海咸颂。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常年奔走在治水工

地，查看水情，勘探地势，家里的孩子都不认识他，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手上全是老茧。这些神话与传说中的先贤都活动在山西一带，是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倡导者、践行者。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民族价值观才逐渐形成、确立。

其次，从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理论建构来看，山西地区的贡献也是非常突出的。从目前存留的史料来看，我们还没有发现炎黄及尧舜禹时期完整的文字资料。所以，对那一时期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传说，其中也包括体现价值观的传说。这些传说基本上没有形成系统的构架，要到周时才有史籍流传下来。这主要是包括《周易》及诸子在内的各种著作。这些著作奠定了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主要范畴、观点、方法。就山西地区而言，与轴心时代出现的诸子关系极大。他们或为三晋人士，或在三晋地区活动，又到其他地区任事。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儒家之子夏、荀子；法家之韩非子、商鞅、李悝、申不害、慎到等；纵横家如苏秦、张仪、公孙衍；兵家如乐羊、尉繚、吴起等；名家如施惠、公孙龙等；杂家如尸佼等。这些十分活跃的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贡献极大。其中一些人甚至具有开创新局、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作用。如荀子，虽然以儒家为名，但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包含了丰富的法家内容。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荀子看作儒家新变的一个关键人物。这种新变就是在儒中分离出了法。所以荀子既是儒家的重镇，又是法家思想的奠基人。而韩非子则在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法的思想及其治国理论。他把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等综合起来，形成了法家完备的思想体系。

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往往需要提出有现实针对性的思想。在这方面，山西地区的实践也具有重要影响，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为增强国力，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为改善农耕地区与周边游牧地区族群的关系，魏绛提出“和戎”方略。这些思想实际上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中价值观的体现。公元15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大航海时代开启，欧洲发生了巨变。这种时代变革也影响了中国那些具有先知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认识到工商业的发展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工商业者是社会的重要力量。也由此而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一批倡导实学、重视民本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山西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傅山提出了“市井贱夫可平治天下”的观点。他认为要重视工商业，以增强国力。同时，指出其中的才俊之士完全可以治理国家。这种思想的出现与当时时代发展的潮流一致，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积极探索。虽然就傅山等人的思想而言，可能还不一定是为适应世界变革趋势出发的，但是他们的观点恰恰对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有着极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戊戌变法时

期，山西人杨深秀是极为典型的一位变革思想家。虽然他的影响没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大，但是发挥的作用却极其重要。他是最早提出变法要求的思想家，也是向朝廷提出有关变法条陈最多的思想家。特别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杨深秀不惧个人安危，要求慈禧太后撤帘归政，终被杀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山西地区思想理论的成果还表现在睁眼看世界，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吸纳方面。按照传说，禹划九州、定五服，可以说是中国人最早关于“天下”观念的体现。这不仅使古代中国人的视野突破了地域上的“中原”，也确立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基本观念与方法，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如何对待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带来的冲击，也体现了不同文化的特征、品格。以中国言，游牧与农耕的冲突基本贯穿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但是，比较而言，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游牧与农耕的冲突呈现出一种时断时续、或和或战的状态。在很多时候，是进入中原农耕地区的游牧族群为农耕族群所同化。而在欧洲，往往是一种原住民被游牧民族驱赶迁徙，甚至灭绝。这种状况的出现，除了地理环境的不同、对抗博弈的方式不同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文化的不同。诸如“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国策，不仅是一种治国之策，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其中就包含着如何看待“外族”或者说异质文化的态度。因此，在一定的时期，可能以战争的形式出现，而在另一特定时期，可能就会以非常和平的形式如贸易、和亲、联盟等形式出现。中国历史上处理中原农耕政权与塞外游牧政权的关系，通关贸易及异族和亲都是十分重要的方式。其最重要的表现是西汉时期汉室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其争夺的焦点在今晋北地区。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开启了大一统以来的和亲政策，一直延续至明清。隋时，隋炀帝杨广宏图大略，经营西域，命裴矩奉敕张掖。裴矩著《西域图记》，详细记录了西域四十四国的山川风情，是中古时期中国历史地理最为重要的著作，也极为生动地表现了当时中国人的“天下观”。与清时兴起的主要由山西人构成的西北史地学派如阎若璩、祁韵士、张穆等的一系列著作，均成为奠定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典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诸如法显、樊守义、徐继畲等所著的《佛国记》《身见录》《瀛寰志略》等更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经典之作，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这里简略列举这些事例，主要是为了说明，中华文化具有开放包容的品格，而山西地区则是这种品格极为重要的体现者、形成地。

第三，从中华文化的实践形态来看，山西地区同样具有非常突出的贡献。一种思想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形态，转化不成对现实世界产生作用的实践形态，是非常无力的，也是缺乏生命力的。在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进程中，山西地区一个非常突出的贡献就是躬耕践行。这种特点其实表现出

理论形成及其意义的原始逻辑形态，即来源于实践，经过总结概括之后形成思想，再回到实践之中。理论的发展进步基本沿着这样的模式循环演进。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形态的形成来看，最早的体现仍然是一种实践形态，并借助于后人的神话与传说流播。如炎黄二帝的行为、尧舜禹的言行，以及各种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等。以在诸子百家中产生影响最大的儒家来看，虽然不同时代各有论述，但在理论形态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仍然是孔子，而在实践形态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关公。

关于这一点，首先要强调的是山西的思想家本身非常重视实践。他们在自己的论述中往往把实践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或者所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如何实践。如子夏，是“孔门十哲”之一，亦可视为儒学之重镇，对儒家学派的传播贡献巨大。但是，他并不简单继承孔子之学，而是强调要与时俱进、经世致用，认为学不能为学而学，还要学以致用。唐代思想家王通，强调教育是为治国安邦培养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必须重视品行的修炼。明代著名理学家薛瑄，被认为是程朱学派的代表、朱熹学说的传人。但是薛瑄的思想与朱熹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强调“行”，认为行难知易，知的目的在行，所以要“知行两得”，“知行兼尽”，不可偏废。在学术研究上，山西地区的学者强调亲力亲为，不能只在书中考证。最典型的就是清时兴起的祁韵士等西北史地学派的研究。这种特点应该说在全国来看是非常突出的。

但是重视实践并不等于就是实践。就山西来说，最为突出的是在实践形态上出现了许许多多堪称表率的典范楷模。前述炎黄二帝及尧舜禹三圣均以躬耕亲力为特点。关公自不必说。在山西地区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士多为在实践形态上有突出表现者。具有浓郁家国情怀的杨家将，虽然有真人真事可依凭，但经过民间文学及艺术的加工演绎，逐渐成为内容体系庞杂、戏剧成分突出的半虚构性史实。实际上诸如杨家将这样的爱国英杰山西还有很多。汉之卫青、霍去病，班超、班勇，冯奉世、常惠；唐之温彦博、薛仁贵、裴行俭；明清之麻贵、任环等。山西还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能臣廉吏。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传统优秀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追求。其中如西门豹、狄仁杰、柳宗元、司马光、姚天福、杨继宗、刘东星、薛瑄、于谦、王家屏、于成龙、陈廷敬、孙家淦、栗毓美、祁寯藻、徐继畲、杨深秀等。这些人不仅在做人作为官方面廉洁清正，而且在做事任职方面都非常能干、富有创新精神，敢于并且勇于任事担责，做出了突出成就。如于成龙，为官四十余年，家无余粮，常吃青菜、食糠粥、衣布衫，被人称为“于青菜”。康熙誉其为“天下第一廉吏”。但是，于成龙并不仅是清廉，还表现在能干上。他整顿吏治、平叛救灾、平反冤案、打击匪盗，所到之处，皆政绩卓著，先后三次被举为“卓异”，是非常善于任事且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做好政务的能

吏、贤吏。这些人的言行从实践的层面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价值标准。

优秀传统文化在山西的实践还非常集中地表现在民间形态中。一种价值观如果没有转化为实践形态，就不可能对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而这种实践形态如果仅是社会上层人物掌握、认知并践行，也难以成为全民族的价值选择。在山西地区，民间的实践也表现得非常生动，甚至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民俗，有的直至今天仍然保持其基本的形态。金元之时，山西各地好学之风盛行。如隰县主簿宋元吉曾言其县“观其民风俭而不陋，朴而不野……其间人物，举止有体，出言有章，郁然有吾儒之气象者”。而据元好问言，在潞泽一带，“士或带经而锄”。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中人们好学之态。明清时期，山西地区重视社会风尚的教化，一些地方甚至采用行政手段来推动。如每年正月与十月，在县学举行乡饮酒礼活动，款待当地年高德劭者，对孝烈之人进行表彰等。这些现象已经难以归结为个人的认知与践行，而是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风气。也可以说，正因如此，在山西地区才表现出对传统优秀文化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或者也可以说，这种现象也是传统文化生命力的一种典型体现。

《品读山西文化》一书并不是对山西文化进行全面完整的“品读”，而是选取了五个方面的典型进行了论述。它们分别是炎帝农耕文化、尧舜德孝文化、关公忠义文化、能吏廉政文化、晋商诚信文化。这些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山西来说，更具有典型意义。今天，我们来品读这些由我们的先人创造的具有极强生命力的文化，不仅使我们能够感受到先人的风骨精神，也将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传承弘扬，使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血脉延绵，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够汲取到极富现实意义的传统基因，并强化其生命力与创造力，具有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因此，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介绍，使我们进一步认识自己的民族，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并对未来充满希望与信心。

2017年7月于并州



2 | 炎帝农耕文化



26 | 尧舜德孝文化



44 | 关公忠义文化




62 | 能吏廉政文化



80 | 晋商诚信文化

品
读
山西文化

山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编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试读结束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SHANXI WENHUA

炎帝农耕文化



肇启农耕 孕育文明

ZHAOQI NONGGENG YUNYU WENMING

“青山巍巍，绿水汤汤……惟吾始祖，首启洪荒。制耒耜，垦草莽。辨五谷，种稻粱。”山西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摇篮，在距今6000多年至5000余年的时候，神农炎帝就在晋东南一带率领先民揖别洪荒，开创了延续几千年的农耕文明。

相传，炎帝传八代，520年，教人种五谷、制耒耜、耕稼穡、尝百草，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之开端。在山西晋东南的长治、晋城地区，关于炎帝的神话传说、遗存遗址、碑碣石刻、庙宇陵园比比皆是，而晋东南更是成为中国粟作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山西大学刘毓庆教授曾经撰文称，晋东南是中华文明的孵化器。

几千年来，以炎帝为肇始的农耕文明不断创新，不仅在农具、水利、种植、技术等物态方面迭代更新，而且在农业实践中渐渐积淀起来的农耕文化也融入了民族的血液当中，覆盖了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民以食为天、以农为本、以和为贵、以礼为重、耕读传家，这些都是农耕文化的重要内容。

而发扬传承这些思想，从中寻找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寻找时代前行的精神动力，正是当今挖掘炎帝农耕文化的价值所在。



下川遗址

农耕文明曙光 源起山西“表里山河”

中国的农耕文明从哪里起源呢？40多年前，在山西晋东南的沁水县下川乡，考古学家们惊喜地发现，出土的遗物中有几十种细石器，其中最令人兴奋的是石磨盘和铤形器。石磨盘，中间由于多次研磨而下凹，显然是加工谷物的痕迹；而铤形器是新石器时代主要农业生产工具石铤的先祖。这个被考古界命名为“下川遗址”的地方，透露出了原始农业的信息。

经碳14测定，下川遗址距今2.3至1.6万年，成为我国现有的最早反映农业形成的考古文化遗址之一。这与距今1.83至1.7万年的世界

最古老的农业考古遗址——埃及尼罗河流域的农耕遗址相比，时间上几近吻合。

“中国农业和文明的中心发源地是半干旱的黄土高原区。”美国芝加哥大学何炳棣教授在《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一文中如此断言。

无论考古学还是地质学，抑或是学界的皇皇论著中，山西都成为研究早期人类历史最重要的省份，同样也是研究人类农耕文化最重要的地区。从远古洪荒到上下五千年，在“表里山河”的山西土地上发生的文明一直连续贯通，从未中断。从距今180多万年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到距今10多万年的山西襄汾丁村遗址，再到距今1.6万年的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山西旧石器遗址遍布全省，而且序列衔接十分密切。1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期，农业和畜牧业普遍出现，其具有典型意义的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龙山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



下川遗址出土的石制品

在山西更是遗存丰富。

农业从1.6万年前一直到距今约7000年的仰韶文化初期，一直都是“刀耕火种”。进入仰韶文化时期后，黄河流域的农业聚落明显有了增加，晋南地区的夏县西阴村遗址中出土了谷子，还出土了蚕茧，襄汾出土了石

西侯度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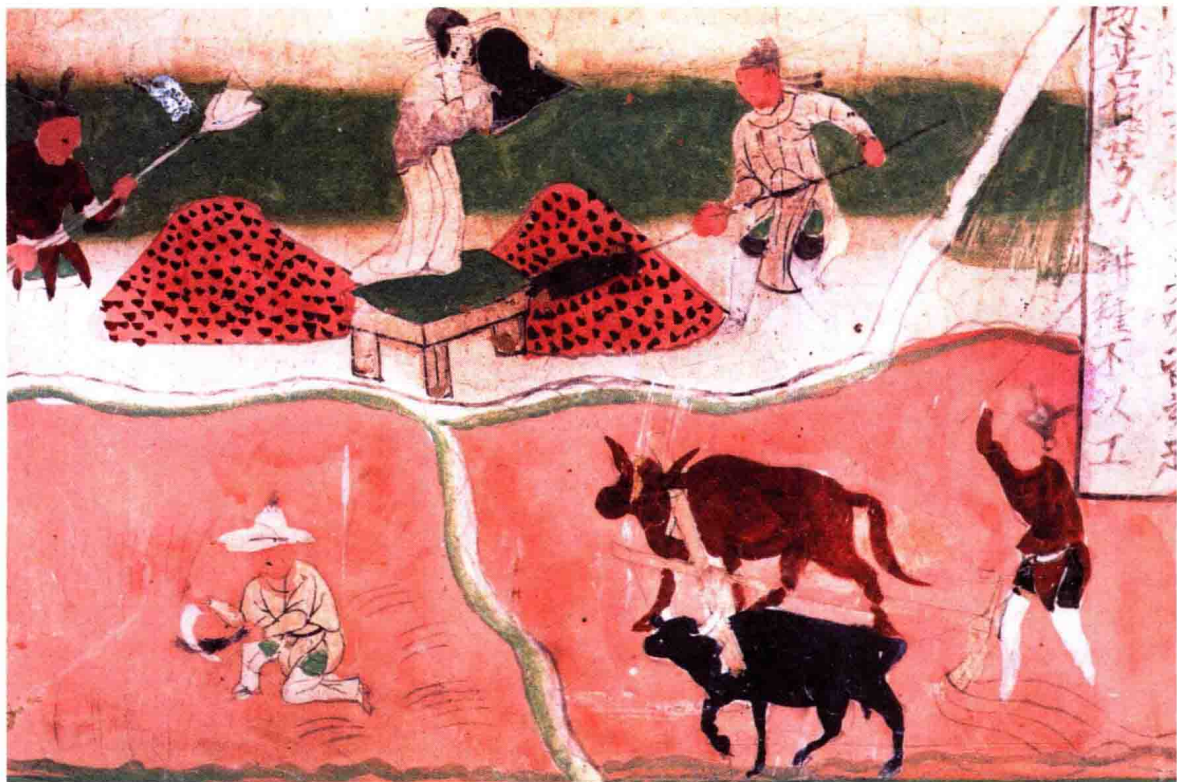
耜，说明农业耕种方式已经出现。到龙山文化时期，农业更是高度发展，这一时期，城址和水井普遍存在。曲沃方城遗址中还出现了石犁。从刀耕到锄耕再到犁耕，可以说，人类农耕文明一点一滴的进步与跨越都在山西有着丰富的文物遗存。

农耕文明的发生、培育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不论地理特点、气候特征，还是水资源分布、土壤条件，山西都可以说“天赋异禀”，注定成为农耕文明的摇篮。山西位居黄土高原东部，地处多个植物带的交会处，为物种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黄土结构均匀、松散，不易风化，有良好的透水性，利于原始工具翻掘。从气候上说，历史上的山西要比现

在湿润温暖，且“遍地林木，一望不彻”。西周时期汾河、涑水流域，人们广泛栽培水稻。《水经注》描述的太行山区是“山上清泉山下溪，窗前竹树尽扶疏”。再从地理上看，正如明末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輿纪要》中所说：“东则太行为之屏障，西则大河为之襟带，北则阴山、大漠为之外蔽，而句注、雁门为之内险；南则首阳、砥柱、析城诸山滨河而错峙，汾、浹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正可谓表里山河，农牧交错，可猎、可采、可耕、可牧、可渔。

山西不仅仅是农耕文明的肇始，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山西的农耕水平一直执全国农业之牛耳。夏商时期，山西土地上的先民就摆脱

《耕耨图》





牛耕

了原始农业，进入沟洫农业时期。所谓“沟洫农业”就是农田水利。人们懂得了农田水利、天文历法，甚至还实行了“抛荒制”。抛荒制是指一块土地连续耕作2至3年后，便另择地开垦新田，两三年后等地力恢复，再返回重新耕作。从甲骨文和考古资料看，粟、黍、麦、稻、粱在当时已是常见作物。到了春秋时期，犁耕、牛耕已在山西推广。山西素有“盐铁之饶”之誉，秦统一全国后，山西的农业发展水平居全国领先地位，耕犁与耨车得到革新与改造，铁器广泛使用，引汾、黄二水灌溉农田的水利技术，更是规模空前。山西农耕技术水平的长足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兴盛，河东、太原与上党三郡尤为突出。

耨



曲辕犁



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是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农学著作。其中实地调查采集的也是包括山西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几省的农业生产技术。到隋唐时期，长平、上党一带“多重农桑”，“男子相助耕耘，妇人相从纺绩”。其中，水利工程更是有30余处之多，居于全国前列。

农耕工具也在不断的革新当中。恩格斯说：“农业工具的出现，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意义。”山西阳城自古就有发达的冶铁业，以生产用于犁耕的犁镜名扬全国，明清时期更为兴盛，年产70多万片，类型就有500多种。在如今的皇城相府，还有专门的阳城犁镜陈列馆。

山西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从源起到雏形再到发展，其文明脉络绵延不断。各个时期的文物、文献、文化为历史提供着有力的佐证。山西，因此也成为研究人类文明的一个典型标本。中国农博馆研究所专家胡泽学先生来晋考察后，编纂了《三晋农耕文化》一书，书中指出：山西农耕历史之悠久、文化积淀之浓厚、内容之丰富，在中国农耕文化的大家庭里，居于领先地位。

炎帝躬耕上党 文化遗存密集

炎帝，也称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众所周知，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商

太行山

